

ZHONGHUAMINGGUOSHICONGSHU



中华民国史丛书

民国教育是民国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教育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石。本书反映了民国时期新旧教育的冲撞,新教育的萌芽、生长情况,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胜利。作者对民国的教育分期、民国教育的体例和方法,以及一些重要问题,均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

申晓云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mingguoshi congshu

KP-27

38-8

中华民国史丛书

顾问：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崇庄 方庆秋 毛 磊
史全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森 段云章 张文惠
张宪文 郭绪印 徐辉琪
黄美真 蒋湘炎 靳德行

8A062/08

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

18827

38-8 申 晓 云 主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

申晓云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通许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72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5-02459-8/R·397

定价12.50元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月11年

绪 言

一 研究民国教育的意义

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民国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讲，是一项崭新而又饶有兴趣的课题。随着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加深，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课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民国教育不论在民国史还是在教育史研究中，又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其研究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民国史研究的角度去看，中华民国教育史是民国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中华民国史作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应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骼、有灵魂的整体，其中经济是骨骼，政治、军事是血肉，思想、文化、教育是灵魂。任何历史研究，缺少了文化、教育层面上的深入，就象研究一个人，倘若只注意到他的躯干和行为，无视其思想、情感，就很难对他有正确、全面的认识。此外，时代更替是经济、文化、教育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华民国时期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和转型期，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广泛发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间变迁、改革、动荡层出不穷，而民

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又往往都与教育有关，可以说教育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神经，它既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对民国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反作用。因此，加强对民国教育的研究，无疑将极大地增强我们对民国时期许多重要社会变革、政治运动、文化现象的理解和说明。

其二、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角度去看，中华民国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了它，中国教育历史的链条就是不完整的。况且，民国教育又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教育自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步入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正是在民国这个时期，教育完成了它的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在这时结束，沿袭至今的现代教育在这一时期中成形。因此，对民国教育进行考察和研讨就不仅具有弄清一个时期教育状况的意义，而且关系的是对整个中国教育变迁考察和认识的问题，这在教育史研究中所具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从发展当代教育，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教育道路的目的去看。民国教育是为整个中国现代教育奠基的教育，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沿续性，历史过程是交错发展的，前期尚未结束，后期已在孕育之中；后期已经结束，前期尚有尾声。当代教育体制的许多重要理论、思潮常常呈现出与民国阶段相因袭、交杂、反复渗透的痕迹。加之，民国教育一直处在新与旧的矛盾、斗争之中，它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形态向旧民主主义教育形态转化，旧民主主义教育又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所取代的历史过程，其间无数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界的先驱为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体制，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革路蓝缕，不懈追求，对教育进行

了反复模仿、调整、实验和尝试，它们的探索精神可敬可佩，他们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都是前人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也都为发展当今教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时代，如何在中国当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新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制，正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对民国教育研究的加强必将对此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从民国教育的研究现状看，随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作为民国上层建筑重要方面的教育的研究虽已不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然而，较之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研究，教育这一课题的开拓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目前已出版的教育通史、简史和有关中国近、现代教育课题的专著中，民国时期的教育都写得过于简略，且笔墨大多侧重于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对民国时期政府的正规学校制度、机构设置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缺少系统、全面的论述和客观、精当的评价。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南师范大学熊明安教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民国教育史专著。该书对民国时期教育制度、内容、方法、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作了综合的研究，给我们清晰勾勒出一个概貌。但或许由于在起步阶段的缘故，书中对民国教育史中若干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研讨，评价上也未脱以往教育专著中大而划之或一言以蔽之的窠臼。相比较而言，台湾方面的一些学老对民国教育的研究要周详、深入些，但有关论著则明显偏重于教育本身制度、法规、机构等内容的铺陈，缺乏实事求是的评析，且因观念限制，介绍中褒贬失当，有些在立论上也有明显失误。因此，进一步加强对民国教育的研究，不仅有其重要性，也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 本书研究方法和成书结构

民国教育在中国教育史的纵向发展中和在民国史的横向结构中所具的特殊重要地位，决定了该项研究不仅需要具备任何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史料性，更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其研究课题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学制、课程、教学法、教育行政机构、法令法规等纯属教育学的问题进行研究，考察教育的概貌；一个方面是对教育规律、思潮、理论等教育学中与一定时期哲学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教育发展的走向。前一类问题主要涉及现代知识传授规律的科学性，后一类问题却必须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课题来解决。十分明显，由于民国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在一个文化思潮激荡，政治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实现自身历史性转变和曲折前进的历史，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对民国教育进行研究时，后一类问题将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撰写采用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相联系，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谓宏观考察和纵向研究，即要从把握研究对象的根本精神和总体脉络入手，把民国阶段的教育与整个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走向、大势联系起来，努力去揭示民国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对民国教育作研究时，着重考察了影响和制约这一时期教育发展进程的重大因素，它们是：一，中华文化传统；二，西方文化输入；三，政治对教育的影响。这三者中，中华文化传统是继承性因素，西方文化输入是发展性因素，这两者的碰撞和结合构成了民国教育进程中贯穿始终的新与旧、西学

与传统、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内容和面貌，民国教育的性质基本是由这两种因素相互斗争、作用的结果所规定的。除了这两种因素外，教育还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在近现代中国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的需要、权力的介入有时会对教育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在民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即据此划分了民国教育的时期和阶段。（划分所持的理由我们将在下文关于民国教育分期问题的探讨中予以进一步论述）鉴于以上宏观考察，我们在构思全著时，在布局谋篇上试着作了这样的安排，即先以“引子”对辛亥前中国教育的变迁略作回顾，把我们对民国教育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大变迁的气候氛围之下。而后根据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对教育控制的特点和影响程度的区别，将民国教育分为前、后两期，前者基本为北京政府时期，后者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再根据各个时期中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征、内容，分别设章、设节撰写。考虑到“民国史丛书”体例的统一，本书未将前后期分上、下编，但大体上，第一、二章为前期，第三、四、五章为后期

除了上述宏观的考察外，用微观研究的方法对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实际状况逐一作出考察和品评也是我们民国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是通过各章中节、目的安排，也即有关教育学基本内容的横向展开来体现的。上面已述，本书各章的划分基本是以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依据的，而每章中各自的设置则是对该阶段政府、学校正规教育的方针政策、学制课程、机构体制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概况的分门别类的考察和系统论述。除此之外，对各个阶段中存在的不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教育，如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解放区教育，抗战时期沦陷区存在的伪满、汪伪殖民奴化教育和反殖民

奴化斗争的情况，我们也都按其存在的时期，分别纳入各章中作了简要的介绍。我们对本著中章、节、目的这一安排是否能够体现我们研究视野和思路，能否较为恰当、周详地表现和概括民国时期教育研究所应具有的内容，还有待于大家的评论和指教。

三 关于民国教育分期的问题

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脉络和外在的阶段特征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逻辑脉络和阶段特征对认识事物具有关键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在对民国时期教育作出总体把握和阶段考察后，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就民国教育进程的时期、阶段划分作出分析。

由于民国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主体部分，以往的教育史专著又较少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作专门研究，所以论及中国现代教育分期的意见也基本体现了对民国教育的分期观点。在大陆教育史学者的一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模式，即以“五四”为界，把中国现代教育分为旧民主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前、后两个时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一书中阐述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兹录于下：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中国文化教育战线上，

‘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也构成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的大半个世纪中，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表现在教育领域，如教育宗旨的制定、

学校制度的变革、课程和教学法的更新,以及留学生的派遣等等。贯穿于这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争论冲突,无不具有上述的斗争性质。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脱离广大群众,他们在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也和他们在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一样,无力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的包围。虽然在这段时期教育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很难说在实质上有什么根本变化。……‘五四’以后就不同了,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崭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同盟军,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反对封建办、法西斯教育,批判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批判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运动的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和十月革命后的教育经验,在革命根据地更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

显然,以上以“五四”为界划分中国现代教育(主要为民国教育)的观点,基本因袭、沿用了中国现代史以“五四”划分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观念。对这一分期观念,史学界正提出商榷,把“五四”作为历史阶段的分期标志尚有许多牵强之处,作为教育分期的根据就更不科学了。诚然,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是个关键的时期,但我们却不能简单视之为划分新、旧民主教育的界标。起码一点,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新质的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还谈不上发展、确立起自己的成熟体系,也并未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五四时期更是只限于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以及对苏联十月革命后新教育体制的零星介绍和传播,在当时很难谈得上有什么重要影响。而被上述分期观点称之为走向末路的资产阶级教育,尤其是西方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思潮却在这一时期中大量涌入，风行一时，并直接导致了五四后的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热潮。因此，我们对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民主主义教育时期的观点是不能苟同的。

让我们再看看台湾学者关于民国教育时期、阶段的划分。以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台北1969年出版）为例。陈首先把中国的近世教育发展总的划分为三个时期：1.萌芽时期（1842年鸦片战争—1894年）；2.建立时期（1894年—1911年辛亥革命）；3.改造时候（1912年—1949年）。我们现在研究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即陈启天所称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改造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教育，陈启天也将之作四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民初至1918年，为教育改制，首定新教育宗旨时期；第二阶段，1919年至1927年，为新教育运动时期；第三阶段，1928年至1937年，为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教育原则的党化教育时期；第四阶段，1937年抗战爆发至胜利为战时教育时期。显然，陈启天先生的这一划分主要依据的是民国时期教育发展、变化的阶段特点，着重于其表面特征，缺少对其形态转换内在精神、规律的把握，而我们认为后一方面的把握对区分教育时期是至为重要的。

由于对民国教育时期的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观念，若要取得共识，我们认为，首先应对划分时期的依据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去看：一看教育发展的整体精神，二看教育所具的基本性质，三看教育演进的阶段特征。如果这三方面能成立，那么我们用来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进程作出考察后可以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教育在整体精神和基本性质上是有共性的，但它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又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如前已述，由于民国阶段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前、后两个统治

时期中，握掌中央政权的上层统治集团的统治基础、社会背景是
有着诸多不同的，对教育的介入程度、控制手段和影响作用也各
不相同，这就使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呈现出阶段性。如果要对民国
教育的时期作一划分的话，我们认为这应是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
所以，我们认为把民国时期的教育按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划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期观念是可取的。为了进一步阐
明这一分期的所持的理由，我们试把这两个时期中政治与教育发
展的关系，教育在精神、走向上的阶段特征，以及在新、旧斗争
进程中斗争内容、形式、结局的不同作一说明和比较：

先从民国前期，也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来看，这一时期中由
于民国初创，国体更新，新、旧势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政治上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几起几落。但从政治的整体特征看，进入
民国后，由于清王朝被推翻，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削弱，复辟势力
尽管能逞强一时，但已难成气候，而袁世凯驾崩后继起的军阀争
战，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上层统治
集团因忙于权力的争夺，对教育无暇顾及。所以，虽有民国二年
起袁世凯为帝制自为在教育领域掀起的“尊孔读经”逆流和旨在
推翻民初资产阶级教育之旨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令”的颁布，但
未几便寿终正寝。一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以“民主”、
“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并由此激发了思想、文
化领域更大的思想解放，在势如潮涌的改革教育声浪中，经过
“五四”洗礼的中国教育界终于冲破了传统的禁锢和束缚，迈开
了向多元化、开放化发展的步伐。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就是中
国教育步出以往清末新教育“中体西用”范畴，较为牢固地确立
其现代民主教育体制的标志。自此而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教育
改革运动继续深入。活跃在“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的著名人士

继续热衷于教育改革的尝试，并开始从讨论一般理论转到方法的探索，从单纯“取法西洋”进入到研究中国国情，将先进的、可供借鉴的西方教育理论、方法付诸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势头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穷途末路，教育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而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直至1928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为国民政府所统一。所以自民国肇创至北京政府垮台这一整个时期，不仅从政治上看有其共性和延续性，从教育史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也宜作民国教育的一个时期，即资产阶级新教育战胜封建复古教育，最终确立起自身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新、旧教育激烈交锋，西学与传统不断碰撞，在这一交锋和碰撞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教育的根基彻底动摇，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民国教育正是在这一时期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中奠定了自身不同于以往清末新教育的基本特性。

再从民国后期，也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来看，自1928年中国由国民党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以后，蒋介石在宣告军事告终，训政开始的同时，为稳固统治，强调思想控制，于是有了党化教育的加强和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以三民主义为唯一教育之旨”的确立。从此，蒋氏“三民主义”大棒挥舞下，教育界自民国前期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度呈现的活跃、开放气氛被横加阻遏，思想受到禁锢，精神重被窒息，多元化复归为一元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被视为异端，“五四”时期被批判的“尊孔读经”、封建伦理、道统重又被捧了出来，不过已给罩上了“三民主义基本精神”的圣衣和光环，中国本位文化被鼓噪、渲染、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噩运，也是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新质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教育的这一状况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未能改善，相反由于国民党对教育

的控制受到教育界民主人士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和抵制，当局的教育政策愈到后期愈趋反动，致使民国教育进程在这段时期内出现徘徊、迟滞、甚至倒退的局面。所以从教育史发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垮台一整个时期也宜作民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实施了与“五四”以来发展起来的教育民主精神相悖的教育政策，尽管教育在完善体制、改进内容、建立法规上仍有所发展，但总的精神是压抑的，中国教育向现代推进的步伐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受到严重阻遏。值得提到的是，与国民政府官方教育每况愈下的状况相反，在国民政府反动当局高压统治和文化围剿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地区，一种新质的教育正在形成。尽管这种教育只能在少数区域推行，既不规范也不完善，且因服务于战争和革命的目的，政治功利远大于其教育目标，但这一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质教育形态从一开始起就体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最终取代了国民党的专制教育。这是民国教育后期发展的轨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前后期教育的明显区别。首先从教育新、旧斗争的内容来看，前期主要表现为文化、思想上的反复古、反复辟斗争，后期则主要表现为文化思想上的民主与专制之争；从教育发展走向来看，前期趋于开放化、多元化，后期则明显趋于保守，定于一尊；从教育发展特征来看，前期动荡、反复，后期则相对沉闷、稳定；从斗争结果来看，前期资产阶级新教育击退了复古、复辟逆流、民国教育确立起其现代体制，后期国民党以专制教育实行对民众控制的企图，因不符和现代教育民主化的根本精神，终究归于失败。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民国教育，随着民国历史的终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声中，步入了新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探索。

四 对民国教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1. 关于民国教育史上大学院制行废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曾一度在教育上试行大学院制，但不到两年即行废止，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对于这一史实，以往国内出版的有关近、现代教育专著均仅将它纳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变迁的小目中稍有论及，对其行废的原因则未曾深究，当然对此制试行的背景，原因过程、意义及其对民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就更不甚了了。我们在对民国教育的研究中，对以往这一被忽略的史实作了认真的探究，并对它在整个民国教育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所具的含义作了重新审视，主要收获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对此一史实全过程的考察，加深了对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方针性质的认识；二，通过对此一史实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具典型性的解剖，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教育发展命运的思考；三，通过对这一史实行废前后教育精神和走向的比较，明确了民国教育分期的界标。以上三点既是我们的研究收获，也是我们对民国教育史上大学院制问题所具意义的认识和评价。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一制度行废的过程略作回顾和说明。

大学院制之试行是由蔡元培提出的。蔡元培乃民国学界泰斗，他既是民初资产阶级“五育”教育的首倡者，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直接推进人。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一个堪称封建堡垒的京师大学堂脱胎换骨，改造成了一所现代教育的生气勃勃的学府，成为孕育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前进阵地。1922年前后教育